

## \* 序跋選錄 \*

# 《姚際恆著作集·序》

## ——姚際恆及其在近代學術史上的地位\*

林慶彰\*\*

### 一、姚際恆其人其事

姚際恆，字立方，一字善夫，號首源，自號首源子，又號首源主人，原籍安徽休寧；數代以來即遷居浙江杭州，根據閻若璩的說法，姚氏小他十一歲，而閻氏生於明崇禎九年（一六三六），則姚氏當生於清順治四年（一六四七）。至於卒年，則沒有足夠的文獻足以證知。

姚氏早年好爲詞章之學，所爲詩文，今存者甚少。但以今存詩作〈西窗絕句〉、〈贈毛奇齡長律二十韻〉觀之，可見質樸自然，文如其人。中年以後，姚氏盡棄詞章之學，專力研究經學，陸續寫下了他的鉅著九種，後來合稱《九經通論》。

康熙三十二年（一六九三）冬天，經由毛奇齡的引介，姚氏認識了閻若璩，並出示所作《古文尚書通論》十卷。令閻氏喜出望外的，姚氏持論多與其所著《尚書古文疏證》不謀而合。閻氏高興之餘，將姚氏之論點引入其《疏證》的有二十餘條。康熙三十六年（一六九七）十一月底，毛奇齡設宴款待由北方來問樂的李塨，姚氏應邀參加。席間，姚氏以所著《古文尚書通論》與《儀禮通論》，送請李塨指正。從此，南方治學的學風也深深影響到李塨。康熙三十七年（一六九八），李塨與錢煌討論《古文尚書》真偽。李塨於考辨之學，本非所長，乃持書向毛奇齡求教，毛氏遂

---

\* 《姚際恆著作集》六冊，爲本處「古籍整理叢刊」第一種，已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出版。

\*\* 本處副研究員。

根據二人的辯說，加上平日考證所得，作成《古文尚書定論》四卷，以反駁閻若璩和姚氏。其間，又與姚氏意見相持不下，毛氏為證成己說，乃將《定論》四卷改為《古文尚書冤詞》八卷，也將攻擊對象擴大為古今所有疑《古文尚書》的學者。

康熙三十八年（一六九九），姚氏因書畫古器得以考古人制器尚象之意，乃作《好古堂家藏書畫記》一書。又繼續作完《儀禮通論》。次年（一七〇〇），錢焯到姚氏家作客多日。此時姚氏《周禮通論》已成書，姚氏與錢焯切磋討論，對日後錢焯作《周禮》辨偽的著作有很大的影響。錢焯又把姚氏著書辨《周禮》的事，告訴毛奇齡，毛氏遂作成《周禮問》一書，其中總論的部分，即在反駁姚際恆。

康熙四十四年（一七〇五），因見經傳所言的《詩經》詩旨都不可盡信，而「漢人說詩失之于固，宋人說詩失之于妄，明人說詩失之于鑿」，乃涵詠篇章，尋繹文義，並辨別前人之言的得失，作成《詩經通論》十八卷，卷前〈論旨〉一卷。康熙四十六年（一七〇七），姚氏六十一歲，因感慨自《春秋》三《傳》以來，皆不得聖人作《春秋》之本旨，乃發憤作《春秋通論》，以辨前人為《春秋》立義例的非是。

康熙五十四年（一七一五），姚氏六十九歲。因感年事已高，人生無多，遂整理家藏書籍，彙編成《好古堂書目》四卷。此後，遂不見有關姚氏的記載。

綜觀姚氏一生，可分為前後兩時期，前期一如毛奇齡等學者，皆嗜好詞章之學。後期則專力治經，以探尋聖人之本義。至於家中度藏書畫之多，一方面得之於家傳，另一方面，也是他的興趣所在，故廣事蒐羅。考辨群經，言論大膽，既是個性使然，也是當時學風的反映。

## 二、姚際恆的著作

姚氏的著作，最重要的是《九經通論》，包括：《易傳通論》六卷、《古文尚書通論》十卷、《詩經通論》十八卷（附卷前〈論旨〉一卷）、《周禮通論》十卷、《儀禮通論》（卷數不詳）、《禮記通論》（卷數不詳）、《春秋通論》十五卷（附卷首〈論旨〉一卷、〈春秋無例詳考〉一卷）、《論語通論》（卷數不詳）、《孟子通論》（卷數不詳）等。此外，還有《庸言錄》、《好古堂書目》、《好古堂家藏書畫記》、《續收書畫奇物記》等書。這些著作，或已亡佚，或僅殘存於後人的著作中。能完整保存下來的僅三、五種而已。茲分別敘述如下：

(一)《易傳通論》六卷（佚）

本書各家書目未見著錄。

姚氏《古今僞書考》論《易傳》真僞時，曾說：「予別有《易傳通論》六卷。」從這句話可知他這本書的書名和卷數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所收《庸言錄》的〈提要〉說：「其姚氏說經也，如關圖書之僞，則本之黃宗羲，……至祖歐陽修、趙汝愚之說，以《周易·十翼》為僞書，則尤橫矣。」這段話則可看出姚氏《易傳通論》的大概內容。

#### (二)《古文尚書通論》十卷（殘）

本書書名，各家著錄略有不同。《經義考》作《古文尚書通論別僞例》，《安徽通志稿》作《尚書通論辨僞例》。然依姚氏《古今僞書考》云：「予前作《古文尚書通論》……。」（經類，《大戴禮》條）可知這書自始即作《古文尚書通論》。

根據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卷八所說，姚氏在康熙三十二年（一六九三）之前即已完成此書。由於有關《古文尚書通論》的相關記載太少，姚氏這部書的體例如何，今已很難確知。閻氏《尚書古文疏證》中引有二十六條。根據這二十六條資料，可知姚氏論辨《僞古文尚書》的方法，與閻若璩相當接近，都是從《僞古文尚書》襲用古書文句；所述與當時事實、情理及制度不符；文章的文理不合經體等方面來考辨。

#### (三)《詩經通論》十八卷，卷首〈論旨〉一卷（存）

本書是姚氏《九經通論》中唯一能保持完整面貌的著作。

根據〈自序〉所署康熙四十四年（一七〇五）冬十月，可知是姚氏比較晚期的著作。清嘉慶十八年（一八一三）秋天，韓城人王篤於其家藏書樓發現本書之鈔本。此時距《詩經通論》脫稿已有一〇八年。王氏於道光十七年將此書刊於四川督學署，為本書有刊本之始。以後所有之刊本、點校本，皆出於此本。

卷前〈論旨〉，旨在評判歷來各家《詩經》學著作之得失，能得到姚氏好評的相當少。正文十八卷，為《詩經》三百五篇之注解。各類詩前有解題，各詩篇先錄經文，然後為各詩詩旨的辨正，再分章加以解析。詩篇文句旁加有姚氏的評點符號，文句下則有押韻說明、標注賦比興，和其他評點語。

書中對朱子之《詩集傳》大加批評，尤其淫詩說，更被姚氏譏為淫穢。對鄭玄更不假辭色。可說是不阿附漢、宋，獨立治學的典型。

#### (四)《周禮通論》十卷（佚）

本書各家書目未見著錄。

毛奇齡〈與李恕谷論周禮書〉云：「近姚立方作《偽周禮論註》四本」。（《西河合集》，書類，卷七，頁一五）毛氏所說《偽周禮論註》，應即是《周禮通論》。毛氏給李恕谷（塏）的信作於康熙三十九年。可見姚氏的《周禮通論》完成於此年之前。

本書的體例、內容，今已不得而知，姚氏《古今僞書考》云：「《周禮》，出于西漢之末，予別有《通論》十卷。」從這段話可知姚氏以為《周禮》為西漢末年的作品。毛奇齡〈與李恕谷論周禮書〉云：「立方（姚際恆字）所著亦秘不示我，但索其卷首總論觀之，直紹宋儒所言，以為劉歆所作。」（同前）從這一段話，又可知姚氏以《周禮》為劉歆所偽造，和宋人所持論點相近。

《周禮通論》雖亡佚，仍可從杭世駿《續禮記集說》所引姚氏《禮記通論》中看出一部分的見解。

(五)《儀禮通論》（卷數不詳，佚）

本書各家書目未見著錄。

顧頡剛於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在杭州崔氏藏書樓發現一部鈔本，並親自複寫一本，存於北京。抗日戰爭時，浙江杭州崔氏藏書被日人席捲而去，顧氏鈔本於抗戰勝利後也失去下落。

根據錢穆先生於顧頡剛處所見鈔本，姚氏自序署年為康熙三十八年（一六九九），可知本書作成於此年。本書雖已亡佚，姚氏有關《儀禮》一書的見解，仍可從姚氏《禮記通論》中略知一二。

(六)《禮記通論》（卷數不詳，殘）

本書各家書目未見著錄。

本書原本已亡佚，杭世駿《續禮記集說》曾引用三十餘萬字。《禮記通論》曾引到《詩經通論》。《詩經通論》作於康熙四十四年（一七〇五），可見本書成書年代更晚於《詩經通論》。杭氏《續禮記集說》云：「（姚氏）著《九經通論》，中有《禮記通論》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帖。」（卷首，姓氏，頁一〇）這種編排方式，與傳統按《禮記》四十九篇之順序排列者不同。柳詒徵《劬堂讀書錄》云：「姚氏自以其意評判《戴記》各篇之高下，而分為上、中、下三等。據杭書所集姚氏之說，有所謂列上帖、列中帖、列下帖者。」（《文瀾學報》第一卷一期）可知，姚氏《通論》分上、中、下帖是一種品評的等級。等級之高下，以是否能得儒學之真義為標準。有關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部分，姚氏以二書皆禪學，應黜回《禮記》中。

(七)《春秋通論》十五卷，卷首〈論旨〉一卷，附〈春秋無例詳考〉一卷（殘存）

本書各家書目未見著錄。今傳各本卷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已亡佚。

民國十八年通學齋書店主人，東莞倫明曾於北平某書肆購得一部殘鈔本。倫氏當時也為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主管購書事。倫氏得此孤本後，又傳鈔一本。一交給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圖書館典藏，一由自己收藏。抗戰勝利後，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解散，其藏書後來歸中央研究院，現藏該院傅斯年圖書館。倫氏鈔本，則歸北京圖書館。

本書卷前〈論旨〉，旨在論辨《春秋》僅有孔子之書法，並無義例。正文按十二公之順序，錄經文，並逐年逐條申釋孔子之書法。卷末〈春秋無例詳考〉，分四十類，詳辨各種義例之非。

(八)《論語通論》(卷數不詳，佚)

本書各家書目未見著錄。

姚氏《春秋通論》於莊公九年論辨公子糾與小白事時，曾云「詳《論語通論》」(卷二，頁九)。又《詩經通論》論「淫詩」時，曾云「見《論語通論》」(頁三一四)。可見，姚氏有《論語通論》一書。

姚氏《詩經通論》作於康熙四十四年(一七〇五)，《春秋通論》作於康熙四十六年(一七〇七)，這兩書既皆引到《論語通論》，可見《論語通論》作於這二書之前。

至於《論語通論》之著書體例和內容，均已難詳知。

(九)《孟子通論》(卷數不詳，佚)

本書各家書目未見著錄。

姚氏《詩經通論》於卷一五〈大雅·桑柔〉、卷一六〈周頌·噫嘻〉，曾兩次引到《孟子通論》。〈周頌·噫嘻〉下曾云：「辨見《孟子通論》〈請野〉節。」可見《孟子通論》是分節論述的。有多少節，今已不得而知。

(十)《庸言錄》六卷(佚)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列入存目中。

本書原有錢塘吳焯瓶花齋寫本。其子吳玉墀於乾隆年間修《四庫全書》時進呈內府，所以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註明：「浙江吳玉墀家藏本。」

本書體例和內容今已不可知，惟根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所云：「是編乃其隨筆筭記，或立標題，或不立標題，蓋猶草創未竟之本。」可見並非完整之著作。《總目》又說，此書內容包羅甚富，其中意見多出人意表。姚氏《禮記通論》殘文，偶有引

及《庸言錄》，可略窺其內容之一斑。

(土)《古今僞書考》一卷 (存)

本書原為《庸言錄》之附錄。鮑廷博將其從《庸言錄》中分出，收入《知不足齋叢書》中，成為最早之刻本。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），張之洞作《輶軒語》，稱姚氏此書為讀諸子之門徑。以後逐漸引起學者注意，民國初年以來，已有二十多種刻本或排印本。又有金受申作《古今僞書考考釋》、顧實作《重考古今僞書考》、黃雲眉作《古今僞書考補證》，足見此書在民初學界的影響力。

本書考辨僞書九十一種，一如《庸言錄》為筭記性質，內容多徵引前人資料，較少自作論斷。

(土)《好古堂書目》四卷 (存)

本書為姚氏家藏典籍的目錄。據書前姚之駟於康熙五十四年（一七一五）所作的〈序〉，可知此書為姚氏所手定，姚之駟鈔了一副本。

本書分為五類，除經、史、子、集外，又有「經史子集總」一類，專收叢書。「經史子集總」一類，即後來叢書類的濫觴。

(土)《好古堂家藏書畫記》二卷，《續收書畫奇物記》一卷 (存)

本書各家書目未見著錄。

嘉慶四年（一七九九）顧修輯刻《讀畫齋叢書》時，將本書收入乙集中，為最早之刻本。後來各種版本，皆根據此本而來。

本書編寫方式有點像藏書家的書錄題跋，於各器物下詳述作者、朝代、形制，如有前人題記、鈐印，則並錄之。《正編》二卷，大多為畫卷的題記，《續編》所謂奇物，有硯石、佛像、古鐘鼎、古琴、印石、南唐澄心堂紙、宋製龍涎香等，種類繁多。

### 三、姚氏在近代學術史上的地位

姚氏在清初也僅是個「諸生」，他沒有顯赫的官位來領導學術。要談他的地位，可以從下列兩個方向來談：一是他在清初經學研究的地位如何？二是他對晚近學術的影響如何？

(一)清初經學研究的關鍵地位

清初經學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辨僞。辨僞的目的，是要分出何者為真經，何者為

偽經。在這種學術風氣下，卓有成就的經學者，即有十餘位之多，如考辨《易圖》的有黃宗羲的《易學象數論》、黃宗炎的《圖學辨惑》、朱彝尊的《太極圖授受考》、毛奇齡的《河圖洛書原舛編》、《太極圖說遺議》、胡渭的《易圖明辨》等皆是。考辨《古文尚書》的有姚際恆的《古文尚書通論》、閻若璩的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反辨偽的有毛奇齡的《古文尚書冤詞》等。考辨《周禮》的有毛奇齡的《周禮問》、萬斯大的《周官辨非》、姚際恆的《周禮通論》等。考辨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的有陳確的《大學辨》、姚際恆《禮記通論》《大學》和《中庸》部分。可說各部有疑問的經書和經說，都遭受到相當嚴厲的批判。

姚際恆著《九經通論》。《易傳通論》是在闢圖書之偽，且以《十翼》為偽書。闢圖書之偽，與黃宗羲、黃宗炎、毛奇齡等人的方向恰好可相呼應。《古文尚書通論》，比閻若璩的《尚書古文疏證》更早完成，所以閻氏書中即引有二十六條之多。也因姚氏和閻氏之考辨《古文尚書》，才激起毛奇齡作《古文尚書定論》四卷的念頭。今傳毛氏的《古文尚書冤詞》八卷，即根據《定論》增訂而成。《周禮通論》以《周禮》為西漢末劉歆所偽作。毛奇齡得知姚氏作《周禮通論》，即根據姚氏書的總論作成《周禮問》一書，以反駁姚氏。又姚氏之論辨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為偽書，也與陳確的觀點相呼應。由此可見姚氏不但是清初考辨群經學者之一，且如就《古文尚書》、《周禮》之考辨來說，姚氏皆居於相當關鍵的地位。我們不能說，如果沒有姚氏，當時的考辨之風也熱絡不起來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姚氏推動了當時考辨偽經的風氣。

再就漢宋學風氣的轉換來說。本來從明中葉起，漢學的風氣已逐漸興起，王鏊、楊慎、鄭曉、黃洪憲等人，皆有「漢人去古未遠」的說法。既如此，漢人的解經就不一定不如宋儒。如就《詩經》來說，從季本的《詩說解頤》起，已開始質疑朱子《詩集傳》的說法，朱謀埠的《詩故》，已將朱子廢棄的《小序》加以恢復。何楷的《詩經世本古義》，不但不採朱子的淫詩說，且以朱子為「無稽」、「邪穢」、「有害風教」等。到了姚氏的《詩經通論》，以為三百篇中並無淫詩，對附和淫詩說的學者，如王柏等人，提出猛烈的抨擊。姚氏甚至以為後人因遵《詩集傳》以至於廢經。朱子《詩集傳》的權威，也因姚氏的批判而逐漸降落。再就《春秋》學來說，從晚唐啖助、陸淳等人開始，有鑒於前人研究《春秋》學太重視《傳》學而忽略《春秋》本經的研究，而提出《春秋》書法和義例。這可說是《春秋》學研究的革命。從宋代以來大多數學者都想從《春秋》中去尋出義例。姚氏則以為《春秋》根本沒有義例，而所謂義例之說，實厚誣宣聖，使《春秋》淪為深文羅織、字字褒貶的刑書，

孔子也成了「法家峻刻之尤」者。姚氏的抨擊，正好深中宋以來治《春秋》學之要害，對以義例研究《春秋》的風氣自是一種打擊。

### (二) 啓導民初學者的治學方向

自民國初年起整理國故運動，可說風起雲湧。所謂「整理」自是包括真偽考辨在內。姚際恆的著作在民國初年流傳還相當少，學者也不知道其中的確切內容。當時，能見到的僅有《古今偽書考》一書，顧頡剛曾敘述其第一次讀此書說：「到了十七歲那一年，始借到浙江書局的單行本，不料讀了之後，忽然我的頭腦起了一次大革命。這因我的『枕中鴻寶』《漢魏叢書》所收的書，向來看為戰國秦漢人所作的，被他一陣地打，十之七八都打到偽書堆裏去了。我向來知道的古人著作毫不發生問題的，到這時都引起問題來了。」（《校點古今偽書考·序》）顧氏認為這是他一生中引起大震盪兩次中的一次，也注定了他畢生治學的命運。胡適之先生是顧氏的老師，他要顧氏尋找姚際恆的著作，並點讀《古今偽書考》，都是想從中了解姚氏疑古思想的真相。錢玄同並於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動手從杭世駿《續禮記集說》中輯出姚氏的《禮記通論》。可見錢氏也希望從《禮記通論》中得知姚氏思想的真相。

此後，顧頡剛開始編輯《辨偽叢刊》，將歷代以來考辨偽書和偽事的著作加以點校編入，也想編輯經部辨偽文字，都可以說是姚氏《古今偽書考》給他的啓發和靈感。姚氏的《古今偽書考》本是一本小書，考辨也不夠精確，但卻能在民國初年影響顧氏一生的治學方向，再由顧氏所建立的古史辨學派來影響整個中國古代史的研究，這也是姚氏所始料未及的。

其次，歷代以來有關《詩經》的研究，一直都受教化說的影響。姚氏雖仍有教化說的影子，但他開創了以文學研究《詩經》的新方向。他解詩的基本原則是「涵詠篇章、尋繹文義」。而解說詩義，則以文藝鑑賞的眼光，予以品評註釋。這點和以前的《詩經》學者實大不相同。他說：「詩何以必加圈評，得無類月峰、竟陵之見乎？曰：非也，予亦以明詩旨也。知其辭之妙而其義可知，知其義之妙而其旨亦可知。」（《詩經通論·詩經論旨》）可見他是想用文學評點的方法來得知詩篇的旨義。他所用的評釋方法有句中評點、論章法結構、修辭技巧等，這是《詩經》研究的一條新路。

清末的方玉潤治《詩經》的理念與姚氏非常相近，方氏大量引用了姚氏《詩經通論》中的說法。民初胡適、顧頡剛等人，研究《詩經》，主張從民歌的角度來探討《詩經》的真相，這點當然受鄭樵、姚際恆、方玉潤等人的影響。晚近，以文學的



角度來研究《詩經》，揭開二千年來教化說的面紗，自是受到姚氏等人的《詩經》研究方法的啓發。

#### 四、今人研究姚氏學術的現況

姚氏的著作，今僅存《古文尚書通論輯本》、《詩經通論》、《禮記通論輯本》、《春秋通論》、《古今僞書考》、《好古堂家藏書畫記》、《續收書畫奇物記》等書而已。今人對姚氏這些著作的研究現況如何？茲簡要敘述如下：

(一)《詩經通論》：胡適、顧頡剛等人開始蒐集姚氏的著作，《詩經通論》和《古今僞書考》最先受到注意。近數十年以來，有關《詩經通論》的研究成果也最豐碩。民國十六年四月，陳柱有《姚際恆詩經通論述評》（《東方雜誌》二四卷七號），十八年，何定生有〈關於詩經通論及詩的起興〉（《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》九集九七期）。這兩篇文章，可說揭開了姚氏《詩經》學研究的序幕。此時，顧頡剛開始根據道光十七年王篤刊本點校《詩經通論》，此一校本，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，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。從此，閱讀姚氏《通論》已有較方便的版本，對於日後姚氏《詩經》學研究風氣的提昇有相當的助益。一九六一年，日本村山吉廣有《姚際恆的學問（下）——詩經通論について》，介紹姚氏《通論》的內容及其貢獻。此為姚氏《詩經》學研究的第一階段，重在姚氏著作的介紹和點校。

自一九八〇年起，可說進入姚氏《詩經》學研究第二階段。首先，一九八〇年有趙制陽的〈姚際恆詩經通論評介〉（《中華文化復興月刊》十三卷十二期），評介姚氏書內容之得失和貢獻。一九八七年，有詹尊權的《姚際恆的詩經學》（新加坡：南安會館）。一九九二年有簡啓楨的《姚際恆及其詩經通論研究》（台北：全賢圖書公司）。這可說是研究姚氏《詩經》學最豐收的時段。

簡啓楨的書，下編專門研究《詩經通論》。對該書的版本、著書宗旨、對《詩經》基本問題的看法、解詩的方法與態度、行文體例等作相當深入的分析。簡氏認為姚氏的《詩經》學是各派《詩經》學中超然的一派，是對傳統《詩經》學的反動。姚氏批評《詩序》說《詩》的固滯、膠結、填湊；批評《毛傳》惟事訓詁，無關經旨；斥責鄭箋依禮說《詩》是魯莽滅裂；斥罵朱子《集傳》為紕繆導淫之書。雖然如此，姚氏《詩經通論》本身仍有不少缺點，如：(1)借批朱子淫詩說，為孔子和漢學辯護。(2)不顧詩歌內容，宣揚封建倫理思想。(3)對前人說詩論著懷有某些偏見，時有過激

之詞。以上之分析、批評，皆甚為精當。簡氏之書可說是近年研究姚氏相當有份量之著作。詹尊權之書分析姚氏對前代《詩經》學家的批評，也相當深入。

(二)古文尚書通論：《古文尚書通論》的殘文，僅存於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中，才二十六條。最先對姚氏研究《偽古文尚書》作研究的是林慶彰。林氏《清初群經辨偽學》就閻氏所引的二十餘條加以分析，歸納出姚氏的考辨方法有三：(1)從晚出《古文》抄襲古書字句，並敷衍成文考辨；(2)從晚出《古文》所述與當時史事、制度不合考辨；(3)從晚出《古文》的文章考辨。林氏以為姚氏考辨晚出《古文》的方法，與閻氏等人甚為相近。這可說是當時學者辨證晚出《古文》的共同方法。有些方法雖不一定有效，然可反映出清初學者考辨古代文獻的一種共同觀點。接著，一九九〇年張曉生有《姚際恆及其尚書禮記學》。《尚書》學部分，除論述《古文尚書通論》之撰述形式和內容概要外，也分析姚氏考辨《偽古文尚書》的方法。

(三)禮記通論：姚際恆將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回歸到《禮記》之中。首先對姚氏《禮記通論》中的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作研究的是林慶彰。林氏從姚氏的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考辨中，發現姚氏的觀點，與陳確非常接近，皆以為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是禪學。姚氏的論辨方法有二：(1)從史料的鑑定證明《大學》非聖人之書；(2)從義理的分析證明《大學》不符聖人之旨。根據這種論辨，可以斷定《大學》非聖人之書。《中庸》一書，姚氏也從三方面證明非孔門之書：(1)由史料證明《中庸》非孔門之書；(2)從義理的分析證明《中庸》不符孔門宗旨；(3)從義理的分析證明《中庸》思想與佛老相合。姚氏認為二書是禪，實是將後來的名詞加於前代文獻之上，恐非評斷文獻之正確方法。接著為張曉生的《姚際恆及其尚書禮記學》。其論辨《禮記》的部分，除討論《禮記通論》的撰述形式外，指出姚氏解《禮記》的綱領有三：(1)《記》文駁雜，於不可通處不必強解；(2)不可執禮解禮；(3)說禮取證於群經及孔、孟之說。此外，又將姚氏論述《禮記》之內容逐篇加以分析。由於姚氏特重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之論辨，所以張曉生將二篇之考辨分兩節論述。對姚氏以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為禪學，也提出批評。

(四)春秋通論：一九三五年日人服部武有〈姚際恆著春秋通論について〉（《東方學報》第五冊續編）一文。這是迄今為止，唯一研究姚氏《春秋通論》的論文。服部氏之論文，對姚氏研究《春秋》應「舍傳以從經，不可舍經而從傳」的論點，有相當深入的分析。服部氏此文，在台灣和中國大陸尚未引起學者的注意。

(五)古今偽書考：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），顧頡剛已為《古今偽書考》作了〈跋〉。

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）胡適要求顧頡剛點讀《古今僞書考》，則揭開了近代研究此書的序幕。此後數十年間，《古今僞書考》的翻印或排印本多達十數種。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，金受申作《古今僞書考考釋》，增補姚書之不足。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，顧實作《重考古今僞書考》，將姚氏所考辨的九十多種書重新加以考辨。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程大璋作《古今僞書考書後》一卷，惜今未見，不詳其內容。此年，顧頡剛將校點《古今僞書考》之心得，作成〈校點古今僞書考序〉，發表於《史學年報》一卷二期（一九三〇年七月）。民國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）黃雲眉撰《古今僞書考補證》，纂輯所有論辨僞書之文字，附於姚氏原書之後，成為《古今僞書考》的集大成之作。黃氏此書經多次翻印，為考釋、補證姚氏《古今僞書考》各書中流傳最廣者。一九五五年，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顧頡剛所編《古籍考辨叢刊》第一集，內收有顧氏點校之《古今僞書考》。後來，台灣世界書局將顧氏點校之辨僞專著裁出，另編成《僞書考》五種，其中也有《古今僞書考》。以上有關《古今僞書考》的研究，大多著重在點校、增補文獻而已。至於姚氏此書在清初學術史上的地位，和對民初學術的影響，則尚未見深入論述。

綜觀有關姚氏著作的研究，以《詩經通論》最多，成果也最豐碩。《春秋通論》、《好古堂書目》、《好古堂家藏畫書記》等書，則尚有待開發。

## 五、開拓姚氏研究的新紀元

自民國以來，姚氏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。一是民國九年起，在胡適、顧頡剛等人提倡下所作的研究，研究的方向為姚氏的懷疑精神，研究重點則為姚氏的《古今僞書考》和《詩經通論》。二是近十餘年來，有關姚氏經學的研究，研究的重點在他的《詩經通論》、《尚書通論》和《禮記通論》。

民國二十餘年以後，有關姚氏的研究所以沈寂下來，是因為當時把姚氏看成一位疑古、反傳統的典型。是和鄭樵、崔述等人相同的。顧氏等人是要藉他們的疑古、反傳統精神，來達到重建古史的目的。重建古史的風潮既已形成、鄭、姚、崔等人就已不是那麼重要，研究的熱潮自然消退。另外，姚氏的著作一直未能有效的蒐集整理，也是姚氏研究未能持續不斷的原因之一。現存的姚氏經學著作有《詩經通論》、《尚書通論》（殘本）、《禮記通論》（殘本）、《春秋通論》（殘本）。其中，祇有《詩經通論》坊間有流傳。《尚書通論》、《禮記通論》兩書，以前錢玄同和顧頡剛都想輯

佚出來，但並未完成。《春秋通論》則祇有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、北京圖書館存有殘本。由於有如許多的困難，姚氏研究的水平當然要受到限制。

筆者於一九八三年完成《明代考據學研究》以後，即繼續從事清初經學的研究，開始從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中去尋找姚氏《古文尚書通論》的佚文；又從杭世駿《續禮記集說》中去找出姚氏《禮記通論》的佚文，過程相當繁複；且其他學者如要研究姚氏，可能都要重複做這種工作。因此，於一九九〇年《清初的群經辨偽學》一書出版後，即開始籌畫姚氏著作的點校事宜。由於所能蒐集到的姚氏著作，僅有八種，並非姚氏的全部著作，所以將這部書稱為《姚際恆著作集》。全書分為六冊，各冊所收之姚氏著作和點校者如下：

第一冊

《詩經通論》 顧頡剛點校

第二冊

《古文尚書通論輯本》 張曉生輯點

《禮記通論輯本》(上) 簡啓楨輯點

第三冊

《禮記通論輯本》(下) 簡啓楨輯佚、江永川標點

第四冊

《春秋通論》 張曉生點校

第五冊

《古今僞書考》 童小鈴彙集

第六冊

《好古堂書目》 林慶彰點校

《好古堂家藏書畫記》 林耀椿點校

《續收書畫奇物記》 林耀椿點校

此一工作的完成，至少有兩項重要的意義：其一、完成錢玄同、顧頡剛以來未竟的事業。其二、方便學界從事姚氏的研究。因此，這一部書的完成，可說開拓了姚氏研究的新紀元。

參加這部書點校的工作人員，張曉生著有《姚際恆及其尚書禮記學》，簡啓楨有《姚際恆詩經通論研究》、林耀椿對中國古代書畫頗有了解。可說是研究姚氏專家的集體工作成果。但是，姚氏著作牽涉的問題太廣，點校時不免有疏漏的地方，敬祈

海內外先進不吝指導。

附記：

本文內容，頗多參考張曉生先生《姚際恆及其尚書禮記學》（台北：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一九九〇年五月）和簡啓楨先生《姚際恆及其詩經通論研究》（台北：全賢圖書公司，一九九二年三月）二書，謹致謝忱。

一九九四年六月